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SHI

中国当代文学史

2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

2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二册

(修订本)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625印张 2插图 270千字

1987年4月第2版

1988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8,250

ISBN7—80534—002—1

I·3 定价: 3.60元

编著单位（以笔划为序）：

山 东 大 学	山东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学院	四 川 大 学	辽 宁 大 学
包头师范专科学校	西北师范学院	苏 州 大 学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安 徽 大 学	安徽师范大学
扬州师范学院	杭 州 大 学	复 旦 大 学
南京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学院	徐州师范学院
厦 门 大 学	福建师范大学	
新 疆 大 学	新疆师范大学	

责 任 编 委

陆士清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仁念	牛运清	何寅泰	李焕仁	季成家	陈 纾
陆士清	胡 剑	浦伯良	徐国纶	唐金海	管 权

编写组（以所在校名笔划为序）：

吴开晋	牛运清	庞守英	刘金镛	冯光廉	李学娴
杜玉华	黄宏真	黄莉如	陆文璧	仲维纲	赵家风
徐国纶	丁尔纲	郭振华	赵锡钧	季成家	浦伯良
廖慧予	卜仲康	王训昭	方仁念	李焕仁	刘普林
贾佑吉	吉明学	石明辉	匡启镛	何寅泰	陆士清
唐金海	鲍善本	金 汉	金 葵	杨建新	韩云彤
苏景昭	陈 纾	王玉芝	薛晨曦	雷茂奎	胡 剑

目 录

第二编 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3
导 言	3
第一节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	8
第二节 新民歌运动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倡导	10
第三节 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	16
第四节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文艺政策调整	20
第五节 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的发展和文艺整风	25
本章小结	28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艺批评	31
第一节 概述	31
第二节 茅盾及其文艺批评论著	37
第三节 邵荃麟、王朝闻、张光年以及侯金镜、李希凡的文艺批评论著	46
第四节 夏衍、陈荒煤、张庚的戏剧电影评论	60
第三章 毛泽东的诗词	71
第一节 中国人民革命的史诗	71
第二节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实践	78
第三节 光辉的艺术成就	83

第四章 郭沫若	91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道路	91
第二节 历史剧《蔡文姬》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99
第三节 诗歌创作的新收获	106
第五章 本时期的长篇小说	114
第一节 概述	114
第二节 柳青及其《创业史》	120
第三节 梁斌的《红旗谱》	133
第四节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142
第五节 《青春之歌》和《红岩》	150
第六节 《红日》和《林海雪原》	161
第七节 《三家巷》等长篇小说(包括《苦菜花》、 《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风雷》和 《大波》)	169
第六章 本时期的短篇小说	178
第一节 概述	178
第二节 马烽的短篇小说	183
第三节 李准的短篇小说	189
第四节 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196
第五节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	203
第六节 刘真、高缨等的短篇小说	210
第七章 本时期的散文	220
第一节 概述	220
第二节 杨朔的散文	225
第三节 刘白羽的散文	233
第四节 秦牧的散文	241
第五节 冰心、曹靖华、陈残云的散文	247
第六节 其他散文作家的作品	252
第七节 《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	259

第八节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报告文学	264
第九节	《燕山夜话》等杂文	268
第八章	本时期的诗歌	273
第一节	概述	273
第二节	贺敬之的诗歌	280
第三节	郭小川的诗歌	289
第四节	李季、臧克家的诗歌	297
第五节	李瑛、张志民、雁翼、陆瑛、饶阶巴桑的诗歌	306
第九章	本时期的戏剧、电影文学	315
第一节	概述	315
第二节	曹禺的话剧	322
第三节	田汉的《关汉卿》	331
第四节	《红色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甲午海战》等话剧	337
第五节	《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新歌剧	341
第六节	《红灯记》、《芦荡火种》等现代戏	346
第七节	《团圆之后》等戏曲	350
第八节	《红色娘子军》、《李双双》、《林则徐》、《早春二月》等电影文学	358

第 二 编

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导 言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四月，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中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主要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因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遭受过严重挫折。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科学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任务，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此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又提出了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

束”^①，今后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八大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指引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并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但是，不久，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坚持、甚至有时完全违背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过程中，为了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攻击，却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总路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此后，又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从而中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常发展的进程，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虽然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中央已经觉察并力图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但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展开了所谓“反右倾”斗争。“反右倾”的结果，不仅使从中央到基层的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而且使经济工作上的“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了使我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国人民付出很大牺牲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扭转这种危重的形势，拨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航向，一九六〇年冬季，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中央又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一九六二年一月，党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采取了必要措施，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国国民经济才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由于对“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进行彻底清算，对这种错误在实践中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建设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清醒的和充分的认识，因而一九六二年之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还有所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①并且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是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在部分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运动中，又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毛泽东并且在一九六五年初，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从反右派斗争以后就在我国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便时起时伏而又日趋严重地延续了下去。而什么是修正主义，又没有作出准确解释。因而，所谓批判“修正主义”，基本上是以“左”倾教条主义为武器，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横加挾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断扩大打击面，不断伤害同志和朋友，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比之政治、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理论和极“左”思潮对文艺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本时期的文艺运动所经历的道路，也就更为复杂和曲折。反右派斗争的结果，实际上中止了提出不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使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匆匆偃旗息鼓。“大跃进”、“反右倾”、人为的新民歌运动，以及不适当地鼓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结果，在中国文艺界掀起了空幻的理想主义和虚夸的浪漫主义浪潮。一时间，浮夸的口号和规划竞相提出，粉饰太平的假大空文学和高大全形象充斥文坛，“左”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十分严重。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经过文艺政策的调整，文艺形势曾经有所好转。但是自从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紧接着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后，又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出现了打击好同志，扼杀好作品，颠倒理论是非的偏差。这种十分不正常的情况，愈演愈烈，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和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实际上为“文化大

革命”的发动，先从文艺界开了第一刀。这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方面。

这段历史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学创作上仍然取得了相当成就。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前后，相继发表了一批优秀长篇小说和长诗，上映上演了一些优秀电影和戏剧。这些作品，足以代表建国以来我国文学创作的水平。一方面“左”倾错误严重，另一方面创作上又取得了相当成就，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第一，这些优秀作品，多数是长篇。作者在前一个时期大都已经开始酝酿或动笔写作。而在本时期，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以后，文艺界思想活跃；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由于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文艺界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形势。这两段时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较好的客观环境。第二，这些优秀作品，大部分是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对民主革命的历史，我们党早有定论，作者在认识上比较清楚，容易把握；同时，它们所表现的具体的题材内容，同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政治没有直接联系，加以对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敌我斗争的突出描写，与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完全合拍，因而容易获得通过并得到鼓励。第三，这些优秀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对所描写的生活有切身体会，又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文学素养。而这正是完成一部优秀作品所必备的主观条件。

本时期的文艺运动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有丰富经验和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乃至教训，无论从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或者从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份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

第一节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春季，我国各条战线包括文艺战线在内，形势很好。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推动和发展这一好的形势，中共中央在这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可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①，有人甚至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为此，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全党干部；六月八日他又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七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于是，反右派斗争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大规模地展开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揭开了序幕，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文艺报》开辟“再批判”专栏，对丁玲、王实味、萧军、罗烽、艾青在延安时期写的一批杂文进行批判，接近尾声。这中间，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作协党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周扬就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后来经过座谈、整理、补充，于一九五八年二月正式发表，题名《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在阐述具体文艺问题的时候，尽管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乃至正确的分析，但由于它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写的，又是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实际总结，因而其基本倾向是不正确的。文章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但由于作者当时处在文艺工作重要领导岗位，因而它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央对文艺形势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评价。

由于文艺工作者是从事精神劳动的，所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文艺界所造成的不幸和损失，在程度上就更加严重，在影响上也更加深远。第一，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许多忠于党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解放思想、敢于讲话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青年文学工作者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当中，有抗战以前就投身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一辈著名作家、诗人和理论家，如丁玲、艾青、冯雪峰等；有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直接培养起来的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如秦兆阳、陈涌、王蒙、白桦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的作家、诗人、理论家，多数被打入了生活底层，而且在实际上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也无法弥补的。第二，严重混淆政治、思想、文艺（学术）问题的界限，错误地批判了一批优秀的或比较好的文学作品，如《在桥梁工地上》（刘宾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等；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或完全可以探讨的文艺理论观点，如“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写真实”（陈涌）、“文学是人学”（钱

谷融)等等。在批判中,又往往采取了用政治批判代替艺术分析、代替学术辩论,无限上纲,轻率地给被批判的作品作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政治结论,把被批判的理论观点又一概称之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正是在这种批判中,助长了理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和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第三,经过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和对一系列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观点的思想批判,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民主已无从谈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也已名存实亡。这样,不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作家、艺术家没有条件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贡献,就是其他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中,思想也要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理论智慧。这个损失是无形的,但却也同样是巨大的和惨痛的。

第二节 新民歌运动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倡导

一九五八年,以创作“大跃进”民歌为标志,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新民歌运动。这场运动,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五八年初,在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大兴水利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人民群众抒发豪情、赞美劳动、歌唱未来的新民歌。这些民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九五八年一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民歌;文艺界也提出了向民歌学习的问题。一九五八年三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搜集点民歌的意见。这样,《人民日报》便于同年四月十四日发表《大